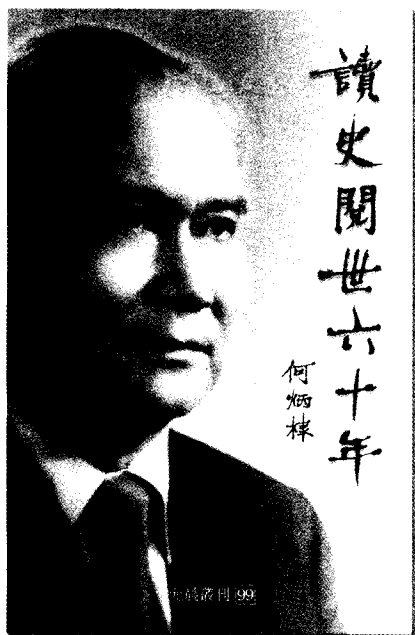


# 何炳棣院士與《讀史閱世六十年》

Ping-ti Ho: Intellectual Reminiscences

何漢威 (Ho Hon-wai) \*



八年前筆者撰寫何炳棣院士《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書評（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五卷（1996））時，結尾中寫了這段話：「筆者要追問的是：作者下一部著作是甚麼？它會帶給讀者甚麼驚喜？」望眼欲穿，何院士撰寫經年的一部極具史料價值的廣義學術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sup>1</sup>終於在本年初分別在臺、港問世。書中何院士現身說法，金針度人，把他治學經驗的心路歷程及師友叢憶，以遠大眼光及誠懇親切態度向讀者娓娓道來。

何院士著作豐碩，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崇高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與一般專攻中國歷史的學人和漢學家有別，他不少重要而富開創性的論著，發表於歐、美第一流社會科學期刊，如《美國人類學家》、《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英]經濟史學報》、《美國歷史學報》等，影響深遠，實不以治中國歷史者為限。就他一生學思歷程所見，在國內的「承受」階段，抗戰前就讀於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從雷海宗、陳寅恪、馮友蘭、劉崇鋮等名學者學習，復深受系主任蔣廷黻高瞻遠矚的治史方針影響；<sup>2</sup>戰時任西南聯合大學助教、教員，所接觸的師友中不乏言行足以啓人終身深思及為後世法者。這兩所大學「兼容並包，自由思辨的學風」對他的影響至為深遠。以庚款獎助出國的「奉獻」階段半個

多世紀中，何院士在哥倫比亞大學治英國史及西歐史，通過千錘百煉的博士候選人口試，完成英國史博士論文後，轉回國史研究。他在其漫長卓越的學術生涯中，再三向高難度課題攻堅挑戰，取得纍纍碩果；其多面性研究跨越七千年的中國歷史，光輝充實兼而有之。過人的意志、<sup>3</sup>稟賦及洞識，豐厚的學殖，加上大時代中不平凡的洗練及見聞，出自這位被禮讚為當代史學泰斗筆下的回憶錄，自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回憶錄洋洋近五百頁，內容美不勝收，最好還是讓讀者親自細嚼品嚐，毋庸多贅。筆者以下就拜讀本書的幾點

\*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vii+494 頁，ISBN 9620762940；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叢刊》99，2004，vii+494 頁，ISBN 957-0329-65-3）。

2 蔣氏認為治史者須有良好的社會科學基礎，主張學生應先修習西洋史，汲取西方史學的方法與觀點後，才去探析綜合國史上的大課題。

3 何院士提到他在清華就讀期間磨練意志的辦法竟是「自我詛咒」：如進城聽一次京戲，留學考試必然落第。他這可笑的預設的出發點是：「一件事的『屈服』就會引起第二件事的『屈服』。」

體會，提出與讀者共享，並就教於高明。

本書最鮮明不過的就是學術氣息至為濃厚。近年來，就筆者讀過的西方史學名家（包括以東亞為專業者），如較早時 William Langer, John K. Fairbank, A. J. P. Taylor, Edwin Reischauer, C. Martin Wilbur，以至最近四年 Arthur M. Schlesinger, Jr.,<sup>4</sup> Eric Hobsbawm 和 Richard Pipes 所撰的回憶錄所見，書中主人翁在其專業領域固成就卓越，象牙塔外的活動、事功或事業也不乏表現，世事洞明，人生閱歷絢爛多彩。相較之下，何院士一生緊守學術崗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純學術人，回憶錄中反更能專就學術層面多所發揮。綜觀全書，何院士的學思歷程幾乎無處不觸及到真正的學術關鍵問題，對學術上是非真理，決以嚴肅態度面對，當仁不讓，從不迴避或缺席，雖孤軍作戰，正義遲來，仍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他兩本巨著《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1969）及《東方的搖籃》（1975）中所持的觀點、立場及結論，儘管備受一批堅持華北最早農業為遊耕制，反對中國農業起源於本土的中西學者圍攻，卻為近日考古發現所證實）。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課程中要求最嚴，最足反映應試學子對專業知識掌握深度及廣度的一關——主修、輔修的最後口試；在長達兩個小時考試中，五位教授就英國史及西歐史所涵蓋的多個領域（政治經濟、思想學說、制度、文獻評論等）輪番考問。像這樣真刀真槍的學術攻防戰，似皆為中外學人回憶錄所未曾措意；賴何院士獨特過人的記憶力，得存書中，成為歷史實錄。1967 年初他在芝加哥大學主辦大型國際中國問題研討會中，宣讀題為〈論中國歷史遺產〉的大綜合力作，從疆域及民族、人口、傳統政治文化、社會教育、經濟五觀點分析中國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遺產。同校東亞語文文化系資深教授 Herrlee G. Creel 認為文中尚有不足或不當，以補充箭記方式加以質疑；Creel 所提四點指摘被何院士逐一反駁，並以如下一段極具震撼的話作結束：「有義務替顧教授（Creel）糾正引用書目中一個一千年（按：實際應為七百年）的錯誤：《西漢會要》的編輯者是南宋末的徐天麟，不是健在的，為世界書局大批翻印古代史籍而堅

持自居『主編』名義的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楊家駱。」北宋理學家張載所撰的《西銘》，氣勢磅礴，言簡意賅，是中國近千年來影響至為深遠，評價至高的哲思論文。1995 年何院士對華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有更為深刻的體會及反思後，採取他生平罕用的大題小作的取徑，撰成〈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一文，得出與絕大多數當代思想史家及新儒家截然不同的結論——「秦漢以降儒家的宇宙本體論是宗法模式的」；《西銘》冠冕堂皇詞語的深層意識實質是為專制帝王的合法性作形而上的辯護。

閱讀這部學術回憶錄，筆者感受最深的是何院士的「真」。書中他對自己的專業成就及學術貢獻侃侃而談，不避「目空當世」及傲慢之嫌。可是他在撰寫《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及《東方的搖籃》時，遇上其他學科（如農業、地質、陶器系統等）專業問題時，不閉門造車，反不恥下問，虛心地向相關學門的成名學者請教，故他每能汲取多學門的綜合成果，提出新見。足見他雖驕傲（想是真正有大成就的學人所難免）卻不自滿。一些出現在自己認為滿意而又廣為學界稱道的論著〈中國歷史上的早熟稻〉中的小錯誤，事隔四十多年，且未影響全文題旨，何院士仍要在回憶錄中向讀者致歉。對於早年的挫折及敗績他在回憶錄中直言不諱。何院士初在清華就讀時，本以化學為主修，因全力投入修習西洋史及英文，致過猶不及，完全漠視高等數學的功課，導致該科大考成績萬難合格，勢必要在下年選修邏輯抵補不合格的學分，這對他自修文史的計畫當是一大打擊。情急之下，他誠實地對講授高等數學的教務長鄭桐蔭道明原委，並表明他如非真用功，懷壯志的學生，決無顏面請求鄭氏予以破格考慮，結果高數一科總算勉強過關。1949 年何院士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邊任教邊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因哈佛大學商學院 Baker 圖書館 Arthur H. Cole 教授食言，未能信守年前承諾：同意何院士所獲的全國經濟史博士論文資助金得延緩一年，讓他能先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踐約。何院士自承這實為「半個多世紀生涯中最大的打擊。」禍不單行，其時系主任即將退休，數度想把其子安插到系任教，而

4 就筆者所見並讀過的僅為寫至 1950 年的一冊 *A Life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Innocent Beginnings, 1917-1950*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兩年後該書並刊行平裝本。

把何院士犧牲掉。悲憤交雜，心煩意亂中，他竟請求校方考慮津貼他全家三口返回上海旅費不足之數約 700 元（加幣），準備束裝回國。上世紀 7、80 年代何院士受愛國情懷驅策，撰有〈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與一系列有關中國大陸資源和經濟前景的論文；現在他表示願意完全忘掉，認為這些論著「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他對自身性格及處世上一些缺陷也毫不隱匿——「終身脾氣急躁」、「往往與中外學人不能和諧共處」。正因為何院士有絕對的安全感，即使坦誠暴露自己，也無損一代大師的形象。

作為史學家，何院士對人和事敏銳的觀察及睿智的反思在回憶中均有所反映，最足發人深省和再三玩味。近十餘年來美國部分研究中國傳統家族及科舉制度的史家僅以有限或「無機」的史料為基礎，對「族」和「菁英」的定義界說含混不清，致過分誇大家族對族中成員向上社會流動的功能，質疑科舉制度是否真正促進社會流動。這類論點所針對的目標明顯是何院士《明清社會史論》一書。何院士除從純方法論的觀點指出此類研究「並無堅實統計根據，多憑主觀揣想」，還以切身實例加以檢視。「多年來捫心自問，經濟上支援族人的能力實在是有限的、『邊緣』的。……最後分析起來，全族能否有新的『成功者』幾乎完全要靠個人的天資、教育、意志和奮鬥。」近廿年來學界掀起一股陳寅恪研究熱潮，不少學人認為陳是「所謂的『清華歷史學派』的核心」。何院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符合當日實情，上世紀 30 年代對清華歷史系師資、課程和教研取向作出重大改革的靈魂人物，是 1929 年從南開聘來出任清大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到抗戰前夕清華歷史系「社會科學、中西歷史、考證綜合，兼容並包的政策」已初步奏效。從清華歷史系的優點，對照近年來中央研究院部分院士主張人文諸所研究應集中單一學門，以求學術進一步專業化，他也有不同的意見。哥倫比亞大學的英史訓練對何院士治學「有樞紐性的重要」，在於讓他具有「沈浸於史料之海的初度經驗與感受」。單就英史而論，百數十年的國會辯論、議會逐年的檔冊報告、各城市地方政府的檔案，以及非官方各種史料、書刊，充塞哥大書庫中，畢生瀏覽不完。對此他作如下語重心長的警語：「初入哥大書庫即深深感到作為華籍學人，切切不可再輕易地順口誇張中國史籍浩如煙海了。」

1958-1959 年何院士應邀到哥大東亞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研撰《明清社會史論》；他以撰寫好的數章就教於理論訓練極強，不易稱許任何人著作的傑出歷史人類學家，初到哥大任教的 G. William Skinner。返回加拿大前，何院士請他坦白的表示讀後意見。Skinner 回答：就史料和「漢學」的角度來看，「此項研究無疑義是『第一等又第一等』的，但在社會科學理論上會不免 clobbered（挨揍）的。」這番話對何院士日後長期研究對象及方針影響甚巨。「明明是一部用社會科學觀點和方法研究社會學上一大熱門課題的著作，居然會被一位很不尋常的社會科學家認為是『漢學』，可見社會科學的川流不是歷史學人所宜輕易投入的，而『漢學』（史金諾此處所謂的『漢學』正是我所謂的『史學』，選題必須有較重要意義，必須從大量多維史料的考訂、詮釋、控制入手）還不失為史家養命之源，豈能棄之若敝屣！四十多年後反思，正是當我最熱衷於應用社科理論治史之際，潛意識中對某些體系甚大、似有創意而數據不足的社科理論已越來越發生抗拒。」目前何院士正進軍古代思想史領域，已撰有專精而甚具原創性的考證論文數篇問世。他解釋遲遲未踏足思想史領域的主因：「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有見於部分思想史家學問上「思考之單軌與見解之偏頗」，甚至「不斷地以自己的新義詮釋古書」，「專找『歧出之義』作為突破口，而任意大轉其彎的論辯方式」，何院士的意見確是肺腑之言。

本書對有志治史的青年學子更不啻是一部「寶典」或「秘笈」（套用武俠小說術語），為他們指引迷津；好學深思者一定可從書中獲益無窮。回憶錄「海外篇」中多處載有何院士研究代表成果的研撰歷程，實為觀摩其治學方法、宏博縝密研究最理想的基點。何院士向以選題攻堅享譽學林，力主研究大題目，解決基本大問題，不屑作二流題目，認為浪費時間精力。他對中國文明起源、農業及農作物、耕作方式、近五百年間社會階層流動、人口及資本累積等錯綜複雜，重要而關聯性高的大課題，俱有闡釋論說。《中國的搖籃》書稿完成後，何院士坦承「選擇另外一個具有相同基本性的新課題實在不容易」，頗覺茫然無所適從。他在回憶錄中所引哈佛大學 J. K. Fairbank 及世界級應用數學家林家翹

說的話：「第一等大課題如果能做到八分成功，總比第二等課題做到九分要好」；「要緊的是不管那一行，千萬不要作第二等的題目。」對有志治史者來說，意境至少應是「雖未能至，而心嚮往之」。因研究大課題及大問題，故何院士極重視論證積累，必以大量多樣的史料為基礎，從不依靠孤證。何院士的博士論文《英國的土地與國家，1873-1910》所引主要史料，除了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的官方檔冊、報告及書刊外，更重要的是竭澤而漁的使用罕為人知的最原始、最具草根性的手冊、文獻等多類史料；真正是近人所撰的第二手著作僅80種，佔全部407種資料的二成左右。他在完成博士論文後發表的首篇中國社會經濟史論文〈揚州鹽商〉中，引用了罕見的乾隆《兩淮鹽法志》中的〈成本冊〉及鹽政高恆的私人文件。研撰《明清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及《明清社會史論》時，數年間他遍閱北美各大圖書館所藏近四千種方志，其中不乏珍本，並盡力搜集登科錄、同年齒錄近百種。因應研究需要，何院士養成必要時自修工具的習慣；攻英史博士論文時，財政學即為其自修工具之一。他也精讀西方史家的名著，充分從西方史學及社科分析工具中提煉效益。受劍橋大學法制史名家 F. Maitland 的不朽巨著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 的啓示，何院士單刀直入，對明、清史志所載「丁」和「畝」這兩塊制度中的基石，賦予革命性的論斷：二者俱為納稅單位，與實際口數或土地面積無關。他對每一史料，必經精細推敲，儘可能運用周密多維平衡的理性思維，加以考釋評估。〈美洲作物傳華考〉（1955）一文中他對這兩類複雜問題：甘藷由陸路傳入雲南，時間上應比由海路傳至福建早二三十年，何以反不易在文獻中追溯到西南各省的早期傳播記錄？玉蜀黍何以最早記載於1555年河南《鞏縣志》？所作的探析論斷就是很好的範例。何院士曾對一位已故學術地位甚高的學人的治學方法作尖銳的譏評。他指出以北美作比喻，該學者的方法「相當於以長島和 Florida 的抱粉數據重建 Kansas 西部及 Colorado 東部（都是半乾旱區）的古自然環境。」何院士提到他於選定研究對象後往往默默地概略作兩種比較：不同文化間的和歷時（不同時代）的。這種取徑「不時能擴展我的歷史視野，導致新

的思路，得出與眾不同的論斷。」儘管何院士晚近著作，和前期比較，確實在考證方面著力尤多，唯整體而言，他的著作一大特色即為既有微觀的細緻考證，復有宏觀的通識綜合，考證處處與綜合相結合。例如，他完成博士論文後，攻堅明、清兩朝社會經濟史的連串大課題中，作為日後基石之作《明清以降人口》序幕的兩篇論著：〈美洲作物傳華考〉及〈中國歷史上的早熟稻〉（1956），前文從大量方志中爬梳出全部傳華作物及其俗名，以堅實平衡的論證理解決了植物學及人類學上美洲主義者<sup>5</sup>及極端文化傳播論者兩個學派之間的一項基本性的懸而未決長期論爭。後文雖考證「秈」稻賦有早熟之義的史原……徽州博物學家羅願《爾雅翼》（1174年序），先前「秈」是指不黏的稻，與早熟無涉；要點卻在於聯繫早熟稻及美洲作物所導致的兩個長期性糧產革命，論證近千年來中國農業系統中主要農作物比重的消長。「從讀書和考試中，我早已知道對某問題如果真能把握，即使短短兩、三分鐘之內也應該能夠簡明地述出要點。」要言不煩的竅門在於掌握要點（何院士這一本領不但見於學術研究，也見於他在西安事變圓滿解決當天（1936年12月25日）到清華學生會辦公室，檢視架上各式各樣的印刷宣傳品，看到中共的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接受張學良、楊虎城津貼400元的收據，立即將之拿走藏好這一驚心動魄的事例）。

對於研究中國近代教育史、學術史、社會史、文化史，以至政治史的學者，書中豐富的史料礦藏，有待他們發掘取資。就書中所見，何院士確是真正的學者，但絕非迂腐說教的學究；他是一位性情中人，深懂生活的藝術和品味。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年逾八十高齡，為力求本書內容翔實，數年來還奔波於圖書館查證史實，以期減少錯誤。書中每字都親自下筆為之。本書如果背後沒有「感情的驅力」，實無可能以目前的面貌出現。何院士在序言中說：「如果本書對歷史社科內外的廣大讀者都能具有一定的可讀性的話，我將引為衰年尚未輟學的歲月裏最大的報償和欣悅。」筆者認為以歷史為專業的學人，尤其是年青學子，對書中論點可以不盡贊同，但如感到枯燥而無法讀下去，只能給他們這樣的建議：是應該考慮改變專業的時候了。

5 主張美洲作物是土生土長，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實無從傳播到歐亞的學派。